



田焯著

# 古璽探研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田  
煒  
著

# 古 璽 探 研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古璽研究概述 / 1

第二節 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 / 12

第三節 本書研究的基本方法及思路 / 33

## 第二章 古璽的起源與分類 / 35

第一節 古璽的起源 / 35

第二節 古璽的分類 / 49

## 第三章 官璽研究 / 78

第一節 官璽零釋 / 78

第二節 官璽所見地區區劃輯錄 / 85

**第四章 私璽研究 / 114****第一節 私璽叢考 / 114****第二節 私璽所見疾病名輯證 / 146****第五章 古璽字詞考釋 / 187****第一節 古璽文字考釋 / 187****第二節 古璽詞語考釋 / 228****簡稱表 / 235****參考文獻 / 236****後記 / 266**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古璽研究概述

古璽研究通常以先秦璽印爲主要對象。衛宏在《漢舊儀》中說：

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秦以來<sup>①</sup>，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說明“璽”作爲天子所用印章的專稱乃秦制。漢因秦制而略有放寬，帝、后、諸侯所用印章皆得稱璽，傳世有“皇后之璽”、“淮陽王璽”等，可以爲證。戰國時期，大率六國均稱璽而不稱印，秦國則多稱印，間或也稱璽，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簡 146 和《爲

---

<sup>①</sup> “自秦以來”，一本作“漢以來”。

吏之道》簡 32(伍)—33(伍)就有“公璽(璽)”和“符璽(璽)”的記載。秦印中還有“繚璽(璽)”(《秦代印風》43 頁)、“疾璽(璽)”(《秦代印風》43 頁)、“賜璽(璽)”(《珍秦(秦印)》282)等,均秦印稱璽之例。至於“璽”得名的緣由,沈兼士先生曾經作過精闢的解釋。他認為“从爾得聲者,有釋爲止義之可能性”,並指出:

《釋名·釋書契》:“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  
以徙釋璽,只取音諧(漢代音),別無證驗,未足以爲確詁也。

.....

即《說文》訓璽爲“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籀文从玉),亦是據後起之制度立說,而“不知所以然之意”也。余謂璽之得名,緣於古代封物之制,以璽抑埴(《淮南子·齊俗訓》云“若璽之抑埴”),制止之使不得輒開露耳(故其字从土)。今以所見之古代封泥證之,便可釋然。蓋“泥”之所以得名,亦由於有尼止之性,故《釋獸》云“威夷長脊而泥”也。<sup>①</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爲吏之道》簡 29(伍)—34(伍)云:

口,關也;舌,幾(機)也。一堵(曙)失言,四馬弗能追也。  
口者關;舌者符璽(璽)也。璽(璽)而不發,身亦毋辭。<sup>②</sup>

① 沈兼士,《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79、81;原載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下冊,北平:中央研究院,1933年。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圖版》部分頁83,《釋文、注釋》部分頁176。按:“辭”字整理者釋爲“薛”而讀爲“辭”,細審簡文,當徑釋爲“辭”。

簡文二“璽(璽)”字一爲名詞，一爲動詞，用爲動詞者與“發”反義相對，知其確有“止”義。

學術界對古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成果是對古璽材料的著錄以及古璽所屬時代的基本確認；第二階段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依靠零散古璽著錄研究的時期；第三階段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延續至今，是依靠綜合性古璽彙編進行系統研究的時期。下面我們簡要地介紹一下各個階段的主要研究成果。

### 一、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

根據相關資料的記載，早在宋元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集古印譜，如北宋楊克一編《集古印格》、南宋姜夔編《集古印譜》、元楊遵編《印譜》、元吾丘衍編《續古印式》等等，可惜均已失傳。明隆慶五年（公元 1571 年），顧從德用原印鈐拓的方法編成《集古印譜》，收錄了古璽數十枚，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古璽著錄。當時顧氏只鈐拓了二十部原鈐本，旋即爲好事者競相購去，大部分印人、學者均難以寓目。明萬曆三年（公元 1575 年），顧氏在《集古印譜》的基礎上略加擴充，編成木刻本印譜，王稚登定名爲《印藪》<sup>①</sup>。《印藪》挾《集古印譜》之盛名，幾經翻刻，流傳至廣。但由於翻刻失真，學者對其多有批評。明代張所敬謂其“翻刻於梨棗，則氣象萎荼，渾

<sup>①</sup> 黃賓虹、羅福頤、曹錦炎等學者均以《集古印譜》、《印藪》爲一書，非是。《印藪》之名最早見於王稚登《〈印藪〉敘》：“爰撰斯篇，嘉名《印藪》。”而王序僅見於萬曆木刻本，隆慶原鈐本《集古印譜》僅有黃姬水、沈明臣二序，故知《印藪》乃專指萬曆木刻本而言。黃賓虹先生說見黃賓虹，《虹廬筆乘》，《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年，頁 237；原載於《學術世界》，1935 年第 1 卷第 1 期至 1936 年第 2 卷第 4 期。羅福頤先生說見羅福頤編，《古璽印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頁 130。曹錦炎先生說見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 年，頁 18。

樸流麗之意無復存者，譬如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無不儼然，乃神氣盡去”<sup>①</sup>，黃賓虹先生謂其“出自鉤摹，鋟之棗木，輾轉失真，多漓古意”<sup>②</sup>。到了清代中晚期，隨著金石學的再度興起，璽印著錄大量湧現，出現了《千璽齋古璽選》等專門的古璽著錄。清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陳介祺收集何昆玉吉金齋、潘有爲看篆樓、葉志詵平安館、李璋煜愛吾鼎齋、吳大澂十六金符齋、吳式芬雙虞壺齋、吳雲二百蘭亭齋、李佐賢石泉書屋、鮑康臆園等多家藏印，合以自家舊藏，編成《十鐘山房印舉》，所錄古璽尤多，冠絕一時。十年後，陳氏得印益多，於清光緒九年（公元 1883 年）改編《印舉》，後來常見的涵芬樓本即據此本影印而來。

學者對古璽時代的認定，經歷了漫長的探索。最早從實物判定三代有璽印的學者是明代的朱簡。朱氏指出：

所見出土銅印，璞極小而文極圓勁，有識、有不識者，先秦以上印也。<sup>③</sup>

印字古無定體，文隨代遷，字唯便用，余故曰印字是隨代便用之俗書。試嘗考之，周秦以上用古文，與鼎彝款識等相類。<sup>④</sup>

對古璽的時代與字體已有所認識。清代董洵在《多野齋印說》中也曾引用朱簡的觀點：

朱文小印，文多不識，而章法、篆法奇古，相傳為秦印，朱

① [明]張所敬，《潘氏〈集古印範〉敘》，《歷代印學論文選》下，杭州：西泠印社，1999 年，頁 446。

② 黃賓虹，《濱虹藏印記》，《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年，頁 290。

③ [明]朱簡，《印經》，《歷代印學論文選》上，杭州：西泠印社，1999 年，頁 140。

④ [明]朱簡，《〈印品〉發凡》，《歷代印學論文選》下，杭州：西泠印社，1999 年，頁 454。



修能定為三代印。<sup>①</sup>

從現有的資料看，所謂“章法、篆法奇古”的“朱文小印”，大部分是戰國朱文小璽。朱簡對古璽時代的判定發前人所未發，可謂慧眼卓識，可惜並沒有得到當時學術界的充分重視，且限於客觀條件，朱氏也沒能在書中舉出實例對其觀點加以說明，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在其後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學術界對古璽時代的探索並沒有新的突破，印學著作多稱古璽為秦璽，或以為三代無印，反不如朱說準確。到了清代中期以後，古璽的時代問題重新引起了學者的重視。乾嘉年間學者程瑤田所撰的《〈看篆樓古銅印譜〉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芝山（引者按：宋葆淳，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鈞”，以謂余曰：“若知‘鈞’為‘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見銅章，有曰‘某鈞’者，嘗疑之，因檢《汗簡》，有之，曰‘籥’字也。籥籥之字，無當於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璽’字耳。《說文》‘璽’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則本从土，以玉為之則从玉，以金為之或又从金也。然據《說文》，璽專屬之王者，而蔡邕《獨斷》則以璽為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惟至尊稱璽，皇帝六璽以紫泥封之。劉熙之釋‘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據二書以為‘璽’从土者，从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則王者守土之說非也。今日‘王氏之鈞’，則卑者稱‘璽’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曰“𠄎埝”，又見有“𠄎余”者，又見有“▽余”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璽’二字也。私

① [清]董洵，《多野齋印說》，《歷代印學論文選》上，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頁298。

璽者，卑者之璽，所謂尊卑共之者也。‘璽’但用‘尪’者，古文省也。……”<sup>①</sup>

正確釋出古璽中的“璽”字，對古璽時代的認定以及古璽的進一步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程瑤田據蔡邕《獨斷》指出“璽為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惟至尊稱璽”，說明他已經認識到“王氏之社(璽)”和“厶(私)尪(璽)”等璽是先秦之物。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徐同柏為張廷濟編《清儀閣古印偶存》，首次列出“古文印”類目。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吳式芬編《雙虞壺齋印存》，在書簽上列有“古璽官印”、“古朱文印”的類目，列在秦漢印之前。其後，陳介祺在《十鐘山房印舉》中正式標出“古璽”類目，置於“周秦”印前。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陳氏在致吳雲的信中指出：

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近兩周者。<sup>②</sup>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正月十二日，陳介祺又在致王懿榮的信中說：

今又向友人借得大古鈇一，至大而鉅奇，乍圖同拓之。此種非佩帶之用，似是左右奉持之制，奇甚古甚，而文與𠄎(都)字者同，則此一種真夏商物矣。又二鈇一“雷首”、一“徒

① [清]程瑤田，《〈看篆樓古銅印譜〉序》，《歷代印學論文選》下，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頁569—571。按：據《〈看篆樓古銅印譜〉序》所述，乾隆丁未(公元1787年)中秋潘有為、程瑤田、張敦仁、宋葆淳相聚賞印而有釋“璽”之事。桂馥《續三十五舉》(乙巳更定本)引程瑤田《通藝錄》也記載了此事，但桂書成於乾隆乙巳年(公元1785年)，則又早於丁未兩年，知程氏追述或有誤。

② 轉引自羅福頤編，《古璽印概論》，前揭，頁131。

口”，“徒口”疑即壺口，或唐虞時禹所乍與？<sup>①</sup>

𠄎是戰國燕系文字的“都”字，“徒口”也見於戰國燕璽。陳氏或以古璽為戰國之物，或以為兩周之物，或以為夏商之物，或以為唐虞之物，其說遊移如此，知其對古璽的時代尚無準確的認識。光緒七年（公元 1881 年），王懿榮在《〈齊魯古印攷〉序》中稱：

自李斯未畫一之前，周末文字各國異形、殊軌分塗，不強同也。蓋六書之旨益微矣，其孳乳繁變，莫可究詰，遂無從鑿識。存於今者，若石鼓及諸小印璽是已。璽之具官名者是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半皆周官。<sup>②</sup>

潘祖蔭在為《齊魯古印攷》所作的序中也說：

自三代至秦皆曰鈐，“鈐”即“璽”字，从金尔聲。璽有土者之印。古者諸侯亦曰璽，不獨天子。《左傳》“璽書，追而予之”是也。<sup>③</sup>

清人對古璽時代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正如陳介祺所說，宋代以來的多數學者都認為三代無璽，經過清代學者的不懈探索，古璽為先秦之物在清末時已經成為了學術界的普遍認識<sup>④</sup>。1925 年

① [清]陳介祺，《光緒元年正月十二日致王懿榮書》，《篹齋尺牘》第五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

② [清]王懿榮，《〈齊魯古印攷〉序》，《續修四庫全書》1565 冊《王文敏公遺集》四·八一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70，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刻本影印。

③ [清]潘祖蔭，《〈齊魯古印攷〉序》，《歷代印學論文選》下，杭州：西泠印社，1999 年，頁 620。

④ [清]陳介祺，《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致吳雲書》，《篹齋尺牘》第十二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

前後，王國維先生根據羅福頤先生的《古璽文字徵》未刊稿作《〈桐鄉徐氏印譜〉敘》，明確指出古璽文字是六國文字<sup>①</sup>。王文鑿破鴻蒙，標誌著古璽時代的基本確認，對古璽文字乃至戰國文字研究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清光緒九年(公元 1883 年)，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正編所收的 1400 餘字中，古璽文字就有 570 多字，是第一部收錄古璽文字的文字編。1925 年，丁佛言先生編撰的《說文古籀補補》出版，也收錄了大量的古璽文字，其中如釋齒爲“登”、釋彡爲“胎”、釋良爲“良”、釋卩爲“掌”等，均頗見精彩。

## 二、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1930 年，羅福頤先生編撰了《古璽文字徵》和《漢印文字徵》，合爲《璽印文字徵》出版。《古璽文字徵》是第一部專門收錄古璽文字的文字編，也是對古璽文字研究的階段性總結。該書共收錄可識的古璽文字 629 字，收入附錄的未識字約 650 字，並在字例下附有辭例，頗便於使用。1935 年，強運開先生編纂的《說文古籀三補》出版，書中也收錄了不少古璽文字，但由於該書不是收錄古璽文字的專書，因此就收錄古璽文字的數量和對古璽文字的釋讀水平而言，《說文古籀三補》都不如《古璽文字徵》。

這段時間較爲重要的古璽論著有陳邦福先生的《古鉢發微》。該書分爲類別、璽式、鈕式、辨質、餘說五章，對古璽作了多方面的討論，屬於綜論性的著作。1985 年，齊魯書社出版了王獻唐先生的遺著《五鐙精舍印話》。該書的撰寫時間大概在 1935 年至 1937

<sup>①</sup> 王國維，《〈桐鄉徐氏印譜〉敘》，《王國維遺書》第一冊《觀堂集林》六·十八—一六·十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年，頁 311—318，據 1940 年商務印書館長沙石印本《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影印。

年間，內容涉及璽印的形制、時代、發現與流傳以及印文的字體、格式與釋讀等諸多問題，是一部重要的印學專著。1958年，吳樸堂先生在黃賓虹先生生前考釋的700餘方璽印中選取了239方，編成《賓虹草堂璽印釋文》，由西泠印社出版。1992年，曹錦炎先生重新對浙江省博物館所藏的黃賓虹先生璽印考釋手稿進行整理，編成《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1995年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後又收錄於上海書畫出版社和浙江省博物館合編的《黃賓虹文集·金石編》，題為《濱虹艸堂藏古璽印釋文》。黃氏雖非古文字學的專門家，但對一些璽文的釋讀卻十分精當，如釋為“軛”、釋為“福”、釋齊璽中的人名為“慶忌”等等，均為不刊之論。

黃賓虹先生除了對藏印進行考釋以外，還寫過一批有分量的印學論文，涉及璽印的性質和用途、璽印的藝術、璽印字詞考釋以及印學史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其中又以1929年發表的《古鉢用於匋器之文字》和1930年發表的《陶鉢文字合證》二文尤為重要<sup>①</sup>。這兩篇文章通過陶璽材料的合證，證明了二者互為表裏的密切聯繫，為古璽與陶文的對比研究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至今仍為學術界所稱道。1959年，李學勤先生作《戰國題銘概述》，在《文物參考資料》第7至9期連載發表。文章第一次將包括古璽在內的戰國文字材料分為齊、燕、三晉、兩周、楚、秦六系進行討論，拉開了古璽分域研究的序幕。1972年，朱德熙、裘錫圭兩位先生合寫了《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考釋出戰國金文和璽文中的“自

① 冰虹，《古鉢用於匋器之文字》，《黃賓虹文集·金石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頁346—347；原載於《藝觀》第3期，1929年。黃賓虹，《陶鉢文字合證》，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年；收入《黃賓虹金石篆印叢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

(官)”字及相關諸字<sup>①</sup>。1978年，朱德熙先生發表《戰國匊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一文，釋出戰國璽文、陶文中的“者”字和“都”字<sup>②</sup>。1979年，羅福頤先生發表《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對清季以來古璽研究的歷史作了回顧<sup>③</sup>。1980年，裘錫圭先生發表《戰國文字中的“市”》<sup>④</sup>，結合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材料對包括古璽文字在內的戰國文字中不同國別的“市”字進行了研究，並正確解釋了一批與“市”相關的古文字材料，對古璽的分域研究起到了極好的模範作用。

### 三、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

1981年，羅福頤先生主編的《古璽彙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錄古璽5600餘件<sup>⑤</sup>，並附有釋文，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古璽著錄。在《古璽彙編》出版以前，古璽材料零散著錄於各種公私印譜，有些甚至沒有公開刊行，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古璽彙編》的出版極大地便利了研究者，為系統研究古璽文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後，羅福頤先生主編，王人聰、葉其峰和紀宏章等學者參與編輯的《古璽文編》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據書中的

---

①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頁59—61、13；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又收入《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② 朱德熙，《戰國匊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16—120。

③ 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次年會論文，1979年11—12月，廣東廣州；後收入《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④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頁285—296；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又收入《裘錫圭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⑤ 《古璽彙編》共收錄璽印5708枚，但有部分並非古璽。

編輯序言介紹，該書是在《古璽文字徵》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共收錄 2742 字，其中正編 1432 字，附錄 1310 字，另有合文 31 例。《古璽文編》還在字例下附有該字在《古璽彙編》中的編號，便於資料的翻檢查對。《古璽彙編》、《古璽文編》配套成龍、珠聯璧合，有力地推動了古璽研究的發展。《古璽彙編》和《古璽文編》出版以後，陸續有學者對兩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修訂。1983 年，吳振武先生發表了《〈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sup>①</sup>，改訂《古璽彙編》中釋文及分類問題數百事，在學術界影響頗大，可惜囿於體例，吳氏並沒有對其中的觀點進行詳細的闡述。次年，吳氏又撰寫了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訂》<sup>②</sup>，對古璽文字的具體釋讀有更為詳盡的闡釋，可以視作前文的補充。1990 年，臺灣學者林素清女士發表《〈古璽文編〉補正》一文<sup>③</sup>，對《古璽文編》中一些文字的釋讀問題作了補正。1998 年，肖毅先生完成碩士論文《〈古璽彙編〉釋文訂補（摘錄）》<sup>④</sup>，對《古璽彙編》的釋文也提出了一些修訂意見。1998 年，施謝捷先生在《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上發表了《〈古璽彙編〉釋文校訂》一文<sup>⑤</sup>，對《古璽彙編》的釋文多有訂正。2006 年，施氏又發表了《談〈古璽彙編〉存在的幾個問題》<sup>⑥</sup>，從收錄材料的局限性、著錄信息的錯誤、鈐本的選擇等方面對《古璽彙編》作了不少訂正和補充。

① 吳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3 年，頁 485—535。

②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 年。

③ 林素清，《〈古璽文編〉補正》，《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990 年，頁 99—121。

④ 肖毅，《〈古璽彙編〉釋文訂補（摘錄）》，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8 年。

⑤ 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訂》，《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644—651。

⑥ 施謝捷，《談〈古璽彙編〉存在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72—198。

《古璽彙編》出版以後，中國大陸、臺灣、港澳特區以及海外又有不少公私藏家出版古璽印譜，較為重要的有《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珍秦齋古印展》、《珍秦齋藏印（秦印篇）》、《珍秦齋藏印（戰國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至三、《中國璽印類編》、《中國璽印集粹》等等。此外，康殷先生與任兆鳳女士編纂的《印典》也收錄了大量的古璽材料，但其中的釋文比較粗糙，誤釋以及釋文前後矛盾的情況頗為常見。

新時期的古璽研究仍然以字、詞考釋為重點，但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有意識地結合歷史、地理、文獻等材料對古璽進行更為深入、系統的研究。由於學術的繁榮以及學術刊物的增多，學者發表意見的機會和管道也越來越多。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討論古璽的論著數以百計，肖毅先生有《古璽文字研究述略》一文<sup>①</sup>，對這個時期的學術成果有簡要的介紹<sup>②</sup>，可以參看。2006年，施謝捷先生完成博士論文《古璽彙考》。據該文提要介紹，《古璽彙考》彙輯古璽總數達10000餘件，幾乎是《古璽彙編》所錄數量的兩倍，可謂古璽著錄中集大成之作。該書還將對各家的觀點作簡要的彙釋，這無疑會給研究者提供極大的便利。該書的出版必定會掀起古璽研究的又一個高潮，頗值得期待。

## 第二節 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

戰國文字上承殷商、西周、春秋文字之餘緒，下啟秦漢文字之

① 肖毅，《古璽文字研究述略》，《人文論叢》2003年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50—460。

② 肖文收集的研究成果截止至2002年。



先河，是漢字演變過程中的重要一環，也是我們研究戰國時期歷史文化以及語言文字使用情況的重要材料。古璽文字作為戰國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語言文字學、歷史學、民俗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下面我們將結合具體的例子，從文字、詞彙、歷史文化等角度談談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

現存的古璽數量相當可觀，古璽文字中“不重複的單字數大概比同時代銅器銘文中的還要多”<sup>①</sup>，為研究戰國文字的形體特點、變化規律提供了大量例證。例如古璽文字的簡化與繁化現象就很值得注意。何琳儀先生把“簡化現象”分為“單筆簡化”、“複筆簡化”、“濃縮形體”、“刪簡偏旁”、“刪簡形符”、“刪簡音符”、“刪簡同形”、“借用筆畫”、“借用偏旁”、“合文借用筆畫”、“合文借用偏旁”、“合文刪簡偏旁”、“合文借用形體”等十三種，把“繁化現象”分為“增繁同形偏旁”、“增繁無義偏旁”、“增繁標義偏旁”、“增繁標音偏旁”等四種<sup>②</sup>，其說甚詳。這些簡化和繁化的現象在古璽文字中均能找到相應的例子，學者對此已多有研討。除了上述情況以外，選擇不同的偏旁往往也會造成文字繁簡的不同。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

很多形聲字，它們的聲旁在先秦古文字和小篆裏有繁簡的不同。有時候，古文字的聲旁較簡，小篆的聲旁本身就是以它為聲旁的一個形聲字。……有時候，古文字的聲旁較繁，它本身就是以小篆的聲旁為聲旁的一個形聲字。<sup>③</sup>

① 裘錫圭，《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中國文物報》1989年1月30日；收入《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202—226。

③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81；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